

讲好老区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运城日报 合办

隐蔽战线二十余载 北平和平解放功臣

阎又文：隐蔽战线杰出战士

阎又文(1914—1962)，万荣县荣河镇郑村人，1937年加入傅作义部队，1938年9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傅作义私人秘书、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处副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重大贡献。1955年，他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副局长，1960年调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1962年9月25日，他因积劳成疾病逝，时年48岁。

“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这是周恩来对我党所有工作人员的要求。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前，阎又文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者。

1962年，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在京病逝。他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碑文中写道：“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共产党党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

碑文的几处表述令人费解：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革命和入党时间却并未交代；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历任职务都清清楚楚，新中国成立前的职务却并未提及，仅以“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一笔带过。

关于他的身份，似乎笼罩着一团巨大的“迷雾”。而这团“迷雾”，直接影响着阎家的子女——“一到政审就卡壳”。究其原因，收到的回复总是“阎又文同志政治历史问题不清楚。”

1993年，这个谜底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举办的一场老同志春节联谊会上被揭开。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在这次联谊会上，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地下工作者王玉。两人在聊天中谈及阎又文后人的境况，王玉激动地说道：“已经过去这么久了，阎又文的事应该可以解密了。”原来，王玉就是当年负责与阎又文绝密单线联系之人。由于一些特殊原因，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长期没有公开。

几天后，王玉将阎家子女带到中共中央原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家中，关于阎又文身份的秘密终于浮现。

1997年，阎又文去世35年后，罗青长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关于他的真实身份和那段尘封已久的潜伏故事才公之于世。

投笔从戎

1914年，阎又文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他自幼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33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大学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并担任该学会刊物《中外论坛》的编辑。

“七七事变”爆发后，阎又文投笔从戎，奔赴延安。他辗转来到延安，见到了

昔日的老师邢西萍(即徐冰)。在老师的建议下，他加入爱国将领傅作义的部队。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傅作义积极与中共合作抗战，关系很好。那时，阎又文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傅作义抗战，加强傅作义部队的政治工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9月，经中共特派员潘纪文介绍，阎又文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个人能力出众、文笔锋锐、处事干练，他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重用，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掀起了反共高潮，傅作义对我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共产党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善安排，阎又文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绝密单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此时的阎又文与组织失联近7年。其间，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与责任，仍按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辅佐傅作义进行抗日工作。

日本投降的前几天，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上级交派的任务，要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

几经波折，装扮成皮货商人“张治公”的王玉以“找弟弟”的名义见到了阎又文。由于失联太久，无法约定接头暗号，王玉只好铤而走险，单刀直入地说：“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这种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方式的确十分冒险，可当时情况特殊，王玉只能冒险求证。

此时，阎又文已经是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对我党更为有利的是，他是傅作义的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都由阎又文负责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阎又文和王玉先后密谈了几次，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向王玉作了详细的讲述。

为了避免暴露，国统区内只有王玉一个人和阎又文联系。解放区内，知晓阎又文身份的只有西北局社会部的少数高层领导。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中共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社会部一室主任)——李克农(中央社会部代理部长)。这也成为日后阎又文的真实身份难以被世人知晓的一个重要原因。

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1946年6月底，国民党撕毁国共两党达成的《停战协定》，大举进攻各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7月底，冀荣臻与贺龙联手围攻大同。蒋介石看到大同岌岌可危，便命令傅作义率部攻打内蒙古重镇集宁，企图“围魏救赵”。最后，傅作义部队虽取得胜利，但双方都损失惨重。

一天，傅作义授意阎又文起草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向毛泽东、蒋介石、美国人以及全国表明他的主张和态度，

要公开理论这场冲突的是与非，要“长自己的志气，灭共党的威风”。

阎又文感到很为难，便将此事经王玉向上级报告，此事一直请示至毛泽东、周恩来。周恩来指示，要掌握一个基本精神：这封信发表以后，要使傅作义和他的官兵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瓦解他们的斗志；要使我们指战员看后，激发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在战场上恨不得把敌人一口吃掉。于是，就有了那封轰动一时的傅作义将军致毛泽东的公开信。

9月20日，傅作义在他的机关报《奋斗日报》上发表了这封公开信。次日，国民党权威报刊全文转载，通栏标题是：傅长官作义致毛泽东先生，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这篇文章言辞犀利，态度强硬。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表示：“奇文共欣赏。”朱德总司令看到电台人员抄收的电文后表示：“请将不如激将!”将此电文发华北解放区连以上干部，以激励将士一雪前耻。

北平解放后，傅作义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阎又文随行。毛泽东在接见阎又文时曾一语双关地说：“阎又文，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啊!”不过，这封公开信也让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误会，使阎又文蒙受了一些不白之冤。

策反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1947年12月，蒋介石任命傅作义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此时，阎又文已晋升少将军衔，除了继续做傅作义的秘书外，还担任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傅作义的对外发言人等职，已经进入华北“剿总”的核心决策层。

1948年5月，李克农派王玉第一次进北平，与阎又文联系。此时，中央已经在酝酿辽沈战役的战略设想，同时，还考虑在华北与国民党大会战。阎又文安排王玉住进相对安全的北平饭店，通过他向中央报告傅作义的最新思想动态。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的成败已成定局。中央军委急于了解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为此李克农和中央社会部派王玉再次进北平与阎又文联系，要求在两周内拿回这一事关全局的重要战略计划。

此时的北平城已是风声鹤唳，国民党特务机关疯狂搜捕中共情报人员。据王玉后来回忆，行前，李克农特意说：“此次进北平，要有被捕的思想准备。万一被捕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暴露阎又文，就算是牺牲了，也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阎又文不负重托，冒着生命危险，仅用一个多星期就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定的战略计划告知中共中央。这一情报对北平的和平解放以及加快全国解放进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合围。此时的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走”“和”之间。他找阎又文商谈，阎又文向他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分析当前面临的这三条路中，“战”和“走”都是对历史、对人民、对部下不负责任的做法，只有“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阎又文还建议傅作义尽早与中共开始谈判，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同时，他还

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安排傅作义的老友以及社会名流做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双方对和平条件达成共识。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阎又文以傅作义将军代表和华北“剿总”发言人的身份在北平中山公园水榭向全世界宣布《北平和平协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千年古都免遭战火，百姓免于流血牺牲。

推迟解开的身份之谜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又文的潜伏任务并未结束。

按照中央的安排，阎又文继续辅助傅作义，推动绥远起义。作为“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委员和傅作义一方的谈判代表，阎又文参与了绥远起义的策划、协商、谈判以及《绥远和平协议》的起草和签字的全过程，为绥远的军队解放军化和地方解放区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随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部长，他点名调阎又文至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依据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阎又文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虽有特供证，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人民的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他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因病逝世。弥留之际，阎又文交给在病床前的妻子留下遗言：“有事找组织。”随即溘然长逝。

关于他身份的秘密，自此石沉大海。直到1993年的那次会面，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才为其子所知晓。

此次会面后，罗青长出面为阎又文证实身份。1993年春，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位子女的单位发去公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作义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于阎又文身份的谜团终被解开。然而，这份证明公函的影响范围有限，仅局限于阎又文子女的单位。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中，把阎又文塑造成了反面人物。

1997年7月10日，罗青长专门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的文章，为阎又文正名。

罗青长写道：“我的战友阎又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

1956年，阎又文曾作诗一首：“独怀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楠。”

木棉花落，永不褪色。这亦是阎又文一生的写照，坚守信仰，从不表达，却无限忠诚。

令，要求将被俘人员交给他们军法处置。张汉民灵活应对，命令残余土匪换上游击队的衣服，就地处决他们。事后，他向敌军报告说：“已全部就地镇压。”他还编造本队在元墩子战役中的“丰功伟绩”，一时间，张汉民团的“捷报”和蒋介石的嘉奖令充斥在国民党各大报的报端。

1934年，张汉民先后以合法身份在团部和勉县秘密接待和护送上海中央局委派的中共陕南特委书记刘顺元、宣传部部长席中瑶，以及西安市委书记书记崔景岳等同志安全过境。同时，他邀请张秉仁到团部主办通讯小报，特请曾任省农协军事部部长、山东省委书记的张含辉随军到陕南执行特种任务。随后，他又动员察绥抗日同盟第七军参谋长周溢三留团担任副团长，请求组织批准曾任陕南特委军委书记的张明远到该团负责党的地下工作。至此，张汉民团的三个营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全团拥有16个配备精良的连队，人数达2000余人。

1935年年初，警卫团受命向关中转移，围剿红二十五军。2月，警卫团扩编为警备第三旅，张汉民任旅长。正值人员调整之际，警备旅奉命阻击红二十五军向东运动。张汉民一边派人向红军报告情报，一边派两个团由镇安县出发尾随红二十五军。4月，张汉民率先带领部队进入柞水县九间房，不幸遇害。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中央追认张汉民为革命烈士。

丁行(1908—1948)，原名丁行之，化名何鹏，夏县瑶峰镇南关村人，192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加入西北军池峰城部，以文书、上校秘书等身份从事党的地下活动，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丁行自7岁起就跟随教书的父亲学习四书五经，8岁时考入县立第一高小，毕业后考入嘉康杰创办的堆云洞平民中学。平民中学被阎锡山查封后，他转入夏县师范讲习所学习。1927年8月，经孙雨亭介绍，丁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党组织先后两次发动农民进城围攻国民党县党部，遭到反动政府的残酷镇压。运动组织者之一的丁行，受党组织指示潜入陕西，加入西北军。

他的上司池峰城行伍出身，作战勇敢，但缺少文化知识。丁行常常给池峰城讲说文、谈论国内国际形势，提合理化建议，并按共产党队伍要求拟定改造池治军计划。时间久了，池峰城部队以军纪严明、勇敢善战而闻名。

池峰城十分赏识丁行的为人和才干。池峰城任团长时，任他为中尉书记；池峰城任旅长时，任他为上尉书记；池峰城任团长，任他为少校军法处主任；池峰城任团长，任他为上校秘书处长。

在丁行心中，在国民党军内升官只是障眼法，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条件，伺机将部队拉出反革命阵营，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守。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奉命坚守娘子关，在阻击日寇期间将敌七十七联队全部歼灭。日军疯狂反扑，战区内的其他国民党部队，尤其是阎锡山部队逃敌即退，致使二十六路军孤军作战，损失惨重……

正当这时，共产党部队贺龙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雄赳赳地挺进敌后，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高歌抗战，这令池峰城和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十分感慨。丁行借机鼓动池峰城：“咱们也搞一个服务团吧!”池峰城点头同意。

1937年11月，丁行奉池峰城的命令赴西安招收战地服务团成员。他在西安平津流亡同学会拜见了该会负责人、共产党员张志强。他开门见山地说来意，张志强听罢一愣，问道：“西安这么多团体，你为何单独找我?”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说：“这件事就拜托了!”张志强心想，这位国民党军官如果不是地下共产党员，就是在思想上倾向共产党，于是便爽快地答应了。

服务团的成员很快确定，这一行人于12月下旬抵达山西霍县三十一师驻地。就这样，三十一师正式成立战地服务团，由池峰城兼任团长，丁行兼任副团长。

征得池峰城同意后，丁行和张志强带领全体团员，到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参观学习。

1938年3月中旬，丁行率领战地服务团随三十一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台儿庄战役。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地服务团高唱《大刀进行曲》等歌曲为战士们鼓劲。在服务团的鼓舞下，三十一师全体官兵光着膀子，手提大刀，奋勇作战。日寇的精锐矶谷师团在这场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

为压制革命力量，1939年，蒋介石下令撤销战地服务团。丁行为了保存党在池部的革命力量，以子弟学校需要教师为由，征得池峰城同意，暗中将共产党员蒋牧良等4位同志留下。

池部在河南舞阳整训期间，丁行效仿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为三十一军制定了以“爱民保爱国卫国”为内容的“十要”“十不要”官兵守则，将其发放给全军官兵，人手一册，随时诵读，认真执行，如有违犯，军法制裁。他还编了一首歌谣：“同甘共苦患难，我们都吃大锅饭。部队是家庭，携手向前干。我们要为民族奋斗，要为建国抗战……”话剧团的同志将其谱成曲子，吃饭前，部队官兵列队高唱，以增强官兵团结。丁行还建议池峰城给官兵家属分发“抗战光荣证”，并要求官兵家属所在地的政府照顾军烈属生活。

这些措施，使全军官兵士气大振，因而该部队在台儿庄战役后，在“襄樊战役”中又一次力挫强敌，取得赫赫战功。

1940年9月，国民党特务要到三十一军里搜查共产党员。此时，三十一军所辖的三个师中，已有两个师建立了党支部。丁行立刻找到张志强说：“孙总司令刚打来电话，他明天和特务一块来，亲自处理这件事。这是护照路费，你带着同志们赶快走。”张志强反问他说：“你呢？不是一起走？”他坚定地回答道：“不，我不能走。若我走了，过去的工作将付之东流。为了革命，就算不幸牺牲，我也会含笑九泉。”

第二天，孙总司令和特务来到三十一军，通过调查获得了一份“黑名单”，“黑名单”中果然有了丁行的名字。经孙连仲和池峰城力保，他才幸免被捕。

1943年，国民党特务在湖北恩施又以有共产党嫌疑为名将丁行逮捕。囚禁半年后，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营救，他才恢复自由。

由于孙连仲和池峰城的信赖，特务们很难加害于他，便企图暗杀。丁行将此告诉了池峰城的随从参谋李景禹。那天夜晚，李景禹亲自带警卫班，把特务队长抓获，在城墙根枪杀。事发后，池峰城觉得事态严重，无奈下将李景禹关押。后来池峰城多方打点、营救，李景禹得以获释。

1944年冬，丁行被调往重庆接受审查，经孙连仲和池峰城的设法营救，他被改送到团部受训。受训期刚满，他就被冯玉祥副委员长指名调动，特务机关只好暂时罢休。

1945年抗战胜利，丁行随孙连仲北上，担任保定绥靖公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并兼任河北省政府机要秘书。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情报小组成员，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党组织提供敌人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还将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77次军事会议内容，及时送向我方。在他任军法处处长阶段，曾保护十多名革命同志免受敌人残害。

1947年，在丁行和其他几位同志的耐心说服下，孙连仲终于表示愿与中共进行谈判。周恩来、叶剑英接电后，当即就此事向北平地下党员负责同志作了指示。不幸的是，党的秘密电台被特务侦破，加之电台负责人李政宣叛变，导致44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被捕入狱，李连被捕123人，整个北方情报网几乎沦陷，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北平共谍案”。作为“北平共谍案”主犯之一的丁行也被逮捕。

丁行被捕后，先被关在北平的监牢里，后又被押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他被捕时，上有70多岁老母，下一女一子。

1948年10月19日早晨5时，他在狱中专心于行李卷上读英语，这时典狱长大喊他的名字。由于他读书太专心，居然没听见。当意识到人生的最后时刻即将到来，他镇静地放下手中的书，同难友握手告别。丁行、谢士炎、朱建国、石淳、赵良璋等5名烈士，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解放后，政府将烈士尸骨重新加棺，移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本版责编 苏黎原 曹欣怡 美编 张徐曼 校对 郝鹏飞

打倭寇激励士气 为革命保护同志

丁行：潜伏敌营二十年